

拂去尘埃的回忆

沈大力

引子

众所周知，回忆是人对畴昔经历的反顾，或一怀春露秋霜，或寓对旧事之褒贬。《论语·子罕》载：“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微子》中则录：“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尔后在西方，古希腊先哲柏拉图似乎接应东方孔圣贤的嗟叹，在忘川面对逝水抒发自己的感悟，确认欲获真知，需要唤起灵魂对理念世界的回忆。这位形而上学大师强调回忆的精神层面，修辞形象恰如我国《诗经·尔雅》里的“回风为飘”，让尘世一切皆随风飘上摩天。

几千年来，从东方孔丘集华夏至仁的《春秋》和印度蚁垤梵音净心的《罗摩衍那》，到泰西的《荷马史诗》和维吉尔的《伊尼特》，再转至冰岛十三世纪大诗人斯诺里·斯图鲁逊的斯堪的纳维亚史诗《埃达》，今人不难发现，一条回忆的经脉传承增润着人类的文明，汇成文学与艺术的源泉，滋养五洲四海黎民百姓的心灵。

文学的回忆与回忆的文学

荷马史诗下部《奥德赛》讲述奥德修斯在返回故乡的途中受阿勒基诺斯王指点迷津，听岛国一游吟歌人回叙特洛伊木马的原委，眼前又重现自己和伙伴们抗拒美人鱼妖歌诱惑等一系列情景。这是远古时代运用回忆来构筑文学的典型。回忆寓于文学之中，也就产生了回忆的文学。文学既是回忆的客体，又是主体，而回忆则为文学修辞的主项。文学与回忆合成了“文学的回忆”，其中回忆非复固定遗迹，而是一种活跃于读者目下的运动。从这一意义上说，文学本身就是回忆。像回忆一样，文学创作是虚拟与现实的化合。通过语言的运用，世界变为回忆的对象。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表明，文学绝非简单的叙事手段，更是传递往昔回忆的泉源，或正如现代阿根廷大诗人博尔赫斯所云：“一座遍布歧径的森林”。爱尔兰现代派作家乔伊斯在1922年起笔的巨著《尤利西斯》中，同样从其“散文大堂”里将回忆由过去引向未来，希冀将世界从时间旧观念的重压下解脱，获得崭新的面貌。这种在螺蛳壳里做道场的特技，无疑为作家制造神话增添了回忆的玄奥色彩。

更典型的回忆文学，当数法国作家玛赛尔·普鲁斯特的长河小说《忆年华》了。仅看作品的题目，中国读者就会想到唐朝托古喻今诗人李商隐的七律《锦瑟》：

“锦瑟无端五十弦，
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
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
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
只是当时已惘然。”

卒读普鲁斯特的《忆年华》，掩卷静思，读者感受的是李商隐恋旧情怀和对逝水流年的怅惘，在回忆时才会有。那位法国“精神贵族”诗人企望以艺术，借不由自主的回忆闪光，在深埋于潜意识的真实里找回往昔的年华。继陀斯妥也夫斯基的《死屋手记》之后，一整部《忆年华》散发着回味旧事的气息。在作者的寻觅途中，一切皆回忆，都是文学泛起的人海泡沫。何况，书中确实将“回忆”与“文学”相提并论，得出了“文学的回忆”一语。当代文论家埃里克·奥尔巴什专门分析《忆年华》的“普遍时间象征”，称之为“意识的回流”。在关于普鲁斯特的论述中，另一学者安东尼·贡帕尼翁干脆将《忆年华》归结为“回忆的小说”（le roman de la mémoire）。他举证道：“这是回忆的场所，回忆的艺术回忆的技巧。在大量草稿簿里，普鲁斯特可以随意翻看，轻易找到几年前写下的段落，重获回忆的空间……”这位教授最后肯定：“《忆年华》是一部存在的文学，以历史家米什莱的方式全面复活了生命。”

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卢梭在《忏悔录》篇首从回忆的角度开启了浪漫诗体的先河。到十九世纪，拉马丁充分发挥回忆的文学功能，将之作为一种桥下流水的动态，在其名篇《湖》里给予了曼妙的诗意处理：

“曾记否？那晚我俩泛舟，
只听见远方水天之间
浆手们击水的节奏……”

诗人坐在萨瓦省的布尔日湖畔，回忆去岁同情人朱莉泛舟湖上的情景。眼下女方重病卧榻巴黎不能前来赴约，他无限伤感道：

“这样，总是划向新岸，
进入永恒的夜，一去不返。
岁月的汪洋里，我们永远
也难抛锚静泊一天。
噢！湖呵！离别经年，
她应重来看近前这滚动的恋波；
可是瞧呀，在你见她坐过的岩石上，
我一人枯坐，影只形单……”

诗篇《湖》乃是一片回忆，回忆的运动。诗情画意的互文性回环不绝，激越着此起彼伏的文学波澜。在上边谈到的普鲁斯特《忆年华》里，这种对缺席者追怀的回忆诗歌特征也曾得到了尽致的体现。

艺术的回忆与回忆的艺术

沧海桑田，艺术从古至今表露着回忆的运动轨迹。公元一世纪的拉丁文大修辞学家昆体良就在其关于“回忆艺术”的论文里阐述了绘画与回忆的关系，为

后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文化史里，雕塑是用形象艺术表达回忆的传统形式。后现代社会又新生出摄影术，用科技来保留记忆，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回忆的视觉依托。摄影照片体现出了对世界形象的回忆，同时也表明回忆与虚拟艺术之间存在着亲缘的血链。

绘画为艺术与回忆提供了表达宇宙时空的交合点。这方面，俄罗斯画家列宾的作品尤为突出。且看他的油画《伏尔加纤夫》、《伊凡雷帝紧抱气绝之子》，尤其是《流放者的归来》。后一幅画描绘沙俄时代被专制暴君流放西伯利亚多年的一个囚徒突然返回家中，令妻女惊愕不已。两个小女孩儿被陌生人的骤现吓得躲到了床底下。画中，久别夫妻各自的表情里流露出二人意外重逢时的悲凉和酸楚，构成一幅撼动人心的回忆画面，富有回忆的艺术感染力。观者会联想到在诗坛发挥回忆象征作用的爱尔兰诗人叶芝和美国诗人兼戏剧家奥登。诗与画中含蓄着回忆的修辞形象，深深触动人们的心弦。

从回忆角度考量美术，可去佛罗伦萨的圣马可修道院。那里边东过廊的墙上有一幅据传为贝托·安杰里戈修士所绘的壁画，系十五世纪中叶的作品。这幅文艺复兴风格的壁画底色泛红，与白墙相映成趣，看上去，有如一团爆燃的焰火又像天空闪烁的星座。今天的观察者用现在眼光审视往昔形象，会顿生时光流逝之感。画上的形象是回忆，又胜似回忆，让人领悟其内在的必然本质，仿佛在琢磨一种抽象艺术。艺术史家乔治·迪第-于贝赫曼从当时历史文化条件，看出了其中美术与回忆叹为观止的奥秘，突破传统阐释寓意画像艺术的陈规，为历史家廓清了“主题”、“隐喻”、“涵义”三者之间的关系。他破天荒提出一个“艺术史批判考古学”，摒弃苏联作家兼心理学家薇拉·巴诺娃囿于人际关系分析的艺术史观旧模式，将重心移至时间复现表象，拒绝时空雾化。或许，乔治·迪第-于贝赫曼为纠正“时代混淆”提出了众人情愿接受的“金科玉律”。在探讨艺术回忆时，他充分考虑原定时代的源泉，尽量采用异质时间蒙太奇，在解释上获取完满的节律协合，而又不失事物的本质。

迄今，我们对文艺复兴时期画家们的艺术研究得还很不够。在圣马可修道院壁画上的发现，确认画师安杰里戈修士恢复记忆的实践和预示将来的艺术才华就使人看到文艺复兴画家的“预兆”与现代美国画家波洛克的“滴彩”之间，似乎存在着始料未及的相似之处。

在国际乐坛上，波兰作曲家维尼亚夫斯基的幻想曲《莫斯科的回忆》至今令听众难忘。回忆产生于时空的距离。维尼亚夫斯基在莫斯科同捷克天才女小提琴家维尔玛·内鲁达联袂举行音乐演奏会时，得罪了一个俄国权贵，被勒令限期离境。在远离俄罗斯的境况里，他回忆那北国的森林草原，耳边响起待嫁村姑轻唱的民歌《红纱拉纺》，于是谱出了《莫斯科的回忆》，在自己的小提琴上奏出他对一方热土的怀恋，余韵不息。

回忆的形成过程也顺沿一条复杂多变的艺术途径。奥地利作曲家马勒生时创作过一部交响乐，其中《大地之歌》根据中国唐朝诗人李白、孟浩然和王维的诗篇谱成。他在交响乐中采用回忆的音符和旋律，奏出浮生幻梦，以音诗将听众引入浪漫境界，体验尘世离合悲欢，诚可谓回忆的音乐。

个体的回忆与群体的回忆

文学艺术作品的回忆中，有个体的，或群体的，社会的，或民族的，祖辈的，还有文化特征的或身份认同的回忆。在这些不同回忆中，无论是个体回忆，还是群体回忆，不论文学回忆，还是艺术回忆，或专从历史角度进行的回忆，

全都脱不出社会学的范畴。因为，人是社会性的，回忆作为文艺创作的要素，必然不可能离开社会学，尽管现代鲁滨逊们在揪着自己的头发，要拼命升天腾空。

一般而言，艺苑不是空中花园，里边也不存在纯粹的象牙塔，其与社会的关系是个难以否认的现实。我在法国《两世界杂志》编辑部的同僚让-彼埃尔·诺格莱特是巴黎三大的英国文学教授。他通过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分析回忆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撰写了专论《巴斯克维尔家族的肖像》。诺格莱特教授注意到，在小说《巴斯克维尔的猎犬》里，福尔摩斯静观庄园中一幅肖像，发现蝴蝶收藏者斯台普顿原来也是巴斯克维尔家族一员，此人重新推出关于荒野猎犬的传说完全是为了威胁他的同族人。诺格莱特认为，这幅肖像不仅让过去重新浮现在福尔摩斯的眼前，而且使他找到了一条即时的破案线索。因此，福尔摩斯与斯台普顿同形对应，二人都从回忆中受到了感悟，面对摆在眼前的现实。

《福尔摩斯探案》同时在探寻回忆的赎救职能，其中作者借用一个人物的口吻说：“但愿你们相信，公正的神明能够惩罚那些有罪的人，但只要他们能祈祷悔过，无论犯了多么深重的罪，也都能得到宽恕。你们知道了这件事，也不用因为前辈们所得的恶果而恐惧，只要自己将来谨慎就可以，以免咱们家族过去尝受的深重痛苦重新落到咱们这些败落的后代身上。”

纵观福尔摩斯的一桩桩探案，多数属于个案，涉及的也都是个体的，或家族的回忆，但毕竟都具有一定的社会性。

英国女小说家乔治·艾略特以创作实践显示了个体回忆的特征，即这种回忆行为与形象密不可分，本身也是具象的。作者回首往昔，让昔日的景象通过语言传递回忆，又突然以形象重新出现，不无迂回地展现柏格森式的“生命冲动”，亦即“真正的时间”。在乔治·艾略特笔下，回忆显示的是一连串内心写照，贯穿着怀旧的思绪和赎救的意愿。个体回忆给人以感应，以树木与森林的关系反映社会面貌。这也是当代法国文学发展的新动向。从这层意义上说，个体回忆促进着对群体回忆的进一步领会。对此，只需细读大文豪夏朵勃里昂的自传《墓外回忆录》，就可略见一斑。

说到群体回忆，人们自然而然想到“民族回忆”。作为一种挥之不去的记忆，民族回忆无疑是当今的普世现象。犹太人忘不了奥斯维辛集中营，中国人铭记南京大屠杀。从文学角度看，人们可以称此为超越时间的“无意记忆”。美国现代作家约翰·帕尔斯在他的小说里就力求反映对群体回忆的思考。依他看来，在小说里回忆过去，并不在于重构一个昔日曾存在的客观现实，而是要用话语在读者面前再现一种美学与社会伦理相关的观念，供人们思量。这一历史叙述学里包孕的正是回忆的伦理，力求通过评议构筑出回忆的化境。

显然，民族的记忆带有浓重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特征。譬如，马提尼克诗人艾迈·西塞尔的《返乡笔记》就是一部非洲黑奴后裔的反思之作。他倡导的“尼格罗德”（la négritude）意识形态充分表露了在西方白人殖民者奴化统治下，非洲黑人维护自身尊严和传统文化的愿望。这一心声震响在塞内加尔诗人大卫·狄奥普的诗篇里。狄奥普回忆，那个如同兀鹰般的白人用“文明的喙”和“洒在奴隶额上的圣水”，在他们利爪的阴影下筑起了“殖民纪元血腥的纪念碑”。从此非洲大陆的原住民沦为“失去一切的人”，痛苦地呐喊：

“我深夜里的塔姆-塔姆鼓，
祖辈的塔姆-塔姆鼓呀！
奴役的锁链撕裂了我的心房。”

大卫·狄奥普不幸于1962年在巴黎-达喀尔航班一次飞机失事时遇难。1980年，我在巴黎找到了他的姐姐克丽丝蒂亚娜-扬德·狄奥普。她是塞内加尔知名学者阿里乌纳·狄奥普的妻子，在夫婿逝世后接办《非洲映像出版社》，位于巴黎拉丁区学府街。我正是在该出版社编辑部会见克丽丝蒂亚娜的。见面那天，她坚称自己无权让非洲黑人的话语在忘却中沉寂，要克服经济困难，不惜代价出版黑人作家维护非洲文化特征的优秀作品。听她一番话，我仿佛看见了一个非洲民族回忆在当代的化身。感于她的热忱，我回国即将大卫·狄奥普的《自由》、《呼唤》等诗篇译成中文，发表在《世界文学》上，让逝者反抗西方新殖民主义的声音在遥远的东方回响。

在大洋彼岸的拉丁美洲，“民族记忆”同样异常强烈。在欧洲纪念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时，拉美国家的民众没有忘记西班牙征服者对印第安人实行种族灭绝的罪恶历史，纷纷怒斥欧美殖民主义者采用暴力和欺诈，扼杀美洲原土地主人的回忆，输出西方文明的恶劣行径。人们不会忘记，美国诗人朗费罗虽然歌颂西方文明，但他却特别尊重印第安人的民族记忆，写出长篇叙事诗《海华沙之歌》，表达了对北美印第安人悲惨遭遇的深切同情，被美国文坛视为一部印第安民族的史诗，文学群体回忆的杰作。

由是观之，回忆可以是民族历史和文化特性的认同，一部凸显寻根意向，照亮当今现实的传灯录。这里，确如魁北克谢尔布鲁克大学教授海伦·吉女士在论述隐迹纸本，强调原迹复现时所说：“问题并不在于重构过去的经历，而需要突出犹存的实在。在此情况下，写作就相当于传承畴昔至今的记忆。”

法国具有优秀的文化传统，在全球化的推土机正辗平五洲之时提出了维护本民族文化特殊性的口号，实际上与美国大众消费文化的扩张相抗衡。1984年，法国首创“文化遗产日”，免费开放各大博物馆及众多平日不对外的历史文化遗址。1991年，欧洲委员会在欧盟的支持下，决定在全欧范围内推广，作为公民教育的重要组成，旨在介绍欧洲丰富多彩的文化，增强欧洲的凝聚力。欧洲现已有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每年秋天八月底至十一月初举办“文化遗产日”活动，通过组织参观提醒大众警惕。“世界村”的出现，虽然在时间上缩短了各国来往的距离，但也在淹没不同文化的差异和异域风趣，导致大众审美日益赤贫化。在国际范围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致力于维持世界各国人民文化特性的努力。这场斗争中，防止回忆“风化”，努力发挥其作用，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朱迪特·施朗热教授在《作品的回忆》一书里强调回忆的“活跃动力”，认为回忆能够作为往昔与今日的文艺“开启桥”，起到文明传承的核心作用。

为了不忘却的回忆

英国十九世纪小说家查理·狄更斯曾曰：“一切人类的记忆都负载着忧伤和烦恼。倘若有能力忘却，我会将之遗忘。”美国当代作家杰拉德·斯坦更是将其现代主义文学观建立在拒绝“心理与文化的往昔”基础之上。他否定“回忆”弃置年表，坚持“持续的现在”，被称为“雾化写作”。

然而，在记忆与忘却之间，事实上存在着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人的回忆是流动的，即“动态回忆”，将遗忘的苦难偶然移录进文艺，乃是一个包括晕厥，乃至弃绝的复杂多变的过程。问题在于研究出一种真正的“遗忘修辞学”，弄清是否因为时蚀的缘故，遗忘变为一种本分，是否忘却旧恶就可以被赦免，或得到救赎。

前面提到法国当代文论家安东尼·贡帕尼翁教授，他在巴黎法兰西学院的讲坛上和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客座提出了关于“回忆本分”（le devoir de mémoire）的理念，强调回忆是一种责任，一个回忆者应承担的义务。有历以来，一些史官，或书生确实是依此理行事的。在中国有左秋明的《左氏春秋》和司马迁的《史记》。在法国有《圣西蒙回忆录》，一部部卷帙浩繁，记载个体和群体的回忆作为一个“子宫”，让后人读之知悉前车之失，慎以史为鉴。哲学家保尔·里格尔在法国《世界报》撰文，论述他所谓的“惬意回忆”，以图理清历史、回忆和遗忘三者之间的辩证依存关系。他分析现今存在于历史见证人与历史学家二者之间的冲突，考虑如何为他们筑起一座“天桥”，从而为研究者的历史与见证者的回忆提供一个互通“弦梯”，最终以充分确凿的历史文献照明回忆的历程，挽回当前的颓势。这与美国诗人热洛姆·罗登贝格在上世纪中叶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证明的信条如出一辙，即：让人回忆过去，是促其看清现在的有效步骤。北非的柏尔柏尔人有句格言：“不知去路，且看来处”。由此，法国当红作家卡瓦纳在他1985年所著小说《玛丽亚》的序语中发挥道：“当人们从往昔过来，赶上现在时，剩下只有一个可能的方向，那就是得面向未来。”凡此种种教谕，若看看美国电视连续剧《月亮》中的“当过去重来”那一集，观众或许会有一些实际的生活体会。

地球上，大江后浪推前浪。诗人阿波里奈尔几度失恋，一次在塞纳河奥德依的米拉波桥上回忆同女画家玛丽·洛朗桑的旧情，孤身一人痛苦地独白：

“米拉波桥下流着塞纳河，
宛如我们爱的逝波。
旧情已成追忆，
犹记那痛定的欢乐……
爱情似流水，
一流而过，
生活这般缓慢，
而希望却如此火热……”

阿波里奈尔这首短诗之所以成为法国现代诗歌的“珠玑”，被千万读者传诵，显然是因为诗人乞灵于人们心灵深处的“回忆本分”，自然而巧妙地获取了回忆的艺术感染力。他虽然嗟叹无可奈何花落去，但依然感到自己为对未来火热的希望驱动。这是人之常情，总不愿过去在回忆的意识流里淹没，而将回忆当作是为了不忘却的纪念。

记得在毛泽东时代有句口头禅：“千万不要忘记过去！”当时众人认为，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当今时代，人们好像已经不认同这一关于回忆作用的信念，觉得往事如烟，不堪回首，不如及时休闲娱乐。君不见在一个趋向超消费的社会里，不少人似乎已经遗忘了过去的伤疤，甚至在创伤未愈之时，已经忘却疼痛。细细思之，岂不悲哉！

《时代三部曲》的回忆

时下，法国学界在探讨每个作者与个体或群体回忆的关系。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动笔同时用中文和法文写了《悬崖百合》、《夜空流星》和《梦湖恋》“时代三部曲”，每一部都以“回忆本分”为动量。

像小说《梦湖恋》中的主人公伊芒一样，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无端遭受构陷，以说“太阳上存在黑洞”被扣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接连挨关押批斗。到文革后期获得暂时行动自由，竟忘了父亲“千万不要当空头文学家”的告诫，突然拿起笔来要写一部关于1957年反右运动的小说，定名为《风雪夜来人》。其时，五七年右派尚未“改正”，连周恩来总理都几次公开表示绝对不允许那年划的右派分子翻案，永远不得刮“翻案风”。这种局势下，要写书为右派鸣冤，显然是冒极大风险。当时，妻子见我中夜起身奋笔疾书，急得跪下哭道：“你反革命还没当够，还想坐牢啊！右派是一辈子都不能翻案的，你写了谁敢给你出版？”我回答：“我只是想写，留下作回忆，并不奢求出版。”妻子欲夺我手中的笔，又道：“人家来抄出你的手稿，岂不又是抓人的罪证，求你千万别胡来！”妻子的眼泪并没有能阻止我心灵的冲动，自己只想将真实的历史回忆笔录下来，把可能再被打成反革命的阴影置之度外。

《风雪夜来人》写的是原北京大学生物系学生夏雨石于1957年因给后来被定为“右派刊物”的学生《整风通讯》捐了一角钱，而被划成右派分子的真人真事。数年后，夏雨石在一个风雪之夜来找我，真是“一声《河满子》，双泪落君前。”他惨痛回忆被送去劳改，又为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大饥荒时饿得偷吃了一点儿猪饲料加判五年徒刑的凄凉经历。不过，我只写成第一章初稿就辍笔了。主要因为突然被派到巴黎教科文总部当国际公职人员，日日忙碌不迭，无暇再兼顾此事。后来，五七年“错划”的右派“一风吹”，“伤痕文学”出笼。我觉得一些“伤痕文学家”们在赶潮流，缺少几分真诚，不愿与之伍，恰应了《金瓶梅》里所云“时不来，他来。时来，他不来。”直至1999年，我才又重新提笔，再度回忆将原作续完，接着出版了法文和意大利文版本，题名为《梦湖恋》。

先后间隔二十来个春秋，在异邦回首逝去的岁月，自然增加了回首反思的深度，益感从1949年解放后日渐风行的“个人崇拜”变为革命的“异化”，而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在中国开放的今天，竟成了远不如大熊猫的“濒危人种”。当不少年轻人不谈过去的时候，我们依然还记得。小说《梦湖恋》展示，虬髯客出洋，离开湖泊到大海，淡水鱼虽然自由多了，甚至可以随处畅游，但反而难以继续生存，只缘海水是咸的。更何况，湖深固然有沉重的压力，但鱼浮到海面上骤失惯性，是势必要死亡的。

今日又追忆旧情，其实当时已惘然，这是《时代三部曲》第一部《悬崖百合》的尾声。1947年7月，蒋介石命胡宗南占领延安。宝塔山下延安保育小学三百余孩子撤离“窑洞城”，在老师带领下开始长途行军，跋山涉水近两年走到石家庄附近，迎接全国的解放。

我八岁时参加了这次儿童行军，在巴黎回忆起孩提时这段亲身经历，先用法文写出了《悬崖百合》，由法国斯多葛出版社更名为《延安的孩子》发行，不久斯彼拉里出版社将之译成意大利文，在亚平宁半岛面世，赢得了众多热情读者。法国、意大利、瑞士、比利时、加拿大和北非近百家媒体评介这部小说。法国国家电台称其为“中国孩子的《奥德修记》”，阿舍特出版集团以“引起轰动的文献”向世界各国推荐。应该说，轰动千万欧洲读者的是中国“儿童长征”本身，再就是回忆这段行军历史的“孩子目光”和“稚气的心灵”：

“从麒麟岩到北京途中，在河北大平原上，我们这些孩子平生第一次吃上了苹果，尝到了自由又甜爽、又酸涩的滋味。我一边啃着多汁的苹果，一边左顾右盼，看见自己行军的小战友朵朵、鸣泉、永杉、山丹姊妹、叶球和天香都幸福地笑了。他们眼里闪烁着激动的泪花，酷似延安崖畔上那含着朝露的一朵朵红百

合。”

读者也许会问，在那样令人欢欣的时刻，作者何来酸涩的滋味。我会回答：这是作者回忆中的一个先兆。在解放后我特意争取考入北京师大二附中，即现今的一零一中学后，这种预感日益强烈。我跟随行军的延安保育小学，本是个温暖的大家庭，其中有一些革命战争和抗日烈士的子女。在圆明园废墟上的师大二附中，我眼见周末一些孩子被家长的小轿车接回城里，而另一些烈士遗孤却遭冷落，因没有父母关爱而感到茫然。此情此景，让我觉得解放后周围的一切已经开始发生变化。此类心绪流露在整部《悬崖百合》里，无意中形成文学中的回忆与预兆。

法国女学者朱迪特·施朗热提出，“预兆”的概念是对存在于一定时间内的作品提出询问，不同于启蒙的作用，而会产生终结与初衷的间距，乃至偏离。文化历史中的预示现象，让人感到了前因后果的必然关系。在乐观的渐进中，若有尔后的悲观，想必确如李商隐所云：“当时已惘然”。事实上，人类文化史的轨迹向来都不是直线型，往往隐含着意义的变数，导致分岔或脱节。在逻辑方面纯粹的西塞罗主义者与反西塞罗主义者之间的歧见，正在于前者扼守传统正典不承认记忆与预兆有间隔，而后者却更情愿接受变化的衡量标准，承认往昔文艺作品里的潜在性，介入具有创造力的跨时空对话。从后者的角度，在评价从柏拉图、拉伯雷到蒙田一些经典作家时，读者应将他们的作品当作一种可变动的活体来阐述，透过其中潜在的预兆，领会超文本集束折射的真象。

依此观点，我在《悬崖百合》的序曲里这样借回忆抒怀：

“在起伏的山岗，
透过波动的云浪，
我瞥见一支驮队
迤迤悠晃在盘陀路上。
我仿佛听见驮畜的铜铃声
远彻沉寂的蛮荒，
回荡在茫茫的天壤……”

最后，一切又渐渐消失，
唯余那驮队玄奥的影象，
忽隐忽现在蔚蓝的穹苍，
让天籁响在我的耳旁：
叮当……叮当……”

在历史小说《夜空流星》的题辞中，我也是采用这一寓意，在回忆里浮现“魔沼”的隐喻修辞格：

“垂髫之时，
我就听说过魔沼。
可它在哪儿，
从来无人知晓。
只是在梦中，
我见过那大自然的幽灵，

那闪耀着希望的
残春的微笑……

流年似水，
多少岁月过去了。
如今我大梦初醒，
不见昔日魂系的魔沼。
噢！魔沼啊，魔沼！
你一向隐形于虚无，
总是那般杳渺。
只有那昔日的梦，
那梦的映象，
透过猥琐的生活，
不时地在我的脑际
飘忽……萦绕……”

长篇小说《夜空流星》追述俄罗斯女史伊丽莎白·德米特里耶娃赴伦敦见马克思，到巴黎参加保卫巴黎公社的战斗，于1918年被契卡逮捕秘密枪杀的悲剧。小说通过作者走访众多历史和现今人物，用一幕幕回忆重现一位女革命英烈的生平，探究了“革命吞噬自己儿女”的惊人异化现象和今人应从中汲取的沉痛教训。

1991年夏天，作者在莫斯科会见苏联著名巴黎公社专家曼弗雷德的遗孀，听伊谈及德米特里耶娃的往事。她说：“我觉得，我们不是要继承历史的灰烬，而要从其中取火，来照亮人类前进的路途。”曼弗雷德夫人的这番话使我更加明确，回忆应该点燃希望的火种，照耀人类的前程，这应当是一个作家的天职。

从文学风格看，《夜空流星》犹如一面透镜，其中流星的轨迹正是回忆的轨迹，即追寻者与被追寻者的双轨足迹，有历史的回忆和先兆，又有今昔对比的思辨和对未来的预感。它按照生活动荡的节奏，以“现时目光”纵横时空，切断情节，择取最冲动的瞬间表露心怀，形成回忆的脉象，尾声是作者在法国圣马洛港仰首眺望的情景：“远处，芒什海峡烟波浩渺，白帆点点，宛若罗浮清梦，乘槎贯月……”

总之，《悬崖百合》、《夜空流星》和《梦湖恋》形成的“时代三部曲”，从历史回忆到当今见闻，从中华黄土高原到放眼全球，作者沿闪回叙述旧事的断续线索，挂上今人抽象的哲理思索，以充溢现代气息，让过去的瞬间成为永不泯灭的怀念。

结 语

无论是文学艺术的回忆，还是回忆的文学艺术，都反映出文艺与逝去岁月的形象联系。无论是个体的回忆，还是群体的回忆，都呈现着一定的社会面貌，为现代科技的优势所不可企及。这中间，先兆具有救赎的特性，起着特殊的启迪作用。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在十九世纪预卜资本主义追求功利的恶果，现已为后工业社会的病态和人们开始对“启蒙哲学”的质疑所证实。今天，西方人迫切感到他们要反思过去，企望一次新的文艺复

兴。他们急需摆脱又在地球上游荡的毁灭幽灵，弥补回忆的缺失，纠正回忆的偏离，重塑回忆有生机的原本功能。一言以蔽之，就是填充“记忆的黑洞”，克服“记忆的晕厥”，治愈由时蚀产生失忆的遗忘症。我国古乐府有一首《休洗红》，曰：

“回黄转绿无定期，
世事反复君所知。”

中国古人在此言明的，正是一种对回忆的觉悟，似乎可以将人类社会从当代空前严重的精神空虚和普遍信仰危机中挽救出来。笔者非出惊人之语，唯愿能促使人们清醒起来，走出浑浑噩噩的怪圈。此为不应推卸的“回忆的责任”，供不甘沉沦于“时代错误”的人们思之。